

Zhongguo Haiguan yu
Zhongguo Jindai Shehui

中国海关与中国近代社会

陈诗启教授九秩华诞祝寿文集

◆ 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 编

主 编 戴一峰

副主编 连心豪 薛鹏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海关与中国近代社会

陈诗启教授九秩华诞祝寿文集

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 编

主 编 戴一峰

副主编 连心豪 薛鹏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海关与中国近代社会:陈诗启教授九秩华诞祝寿文集/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1

ISBN 7-5615-2319-X

I. 中… II. 厦… III. ①陈诗启-纪念文集②海关-历史-中国-近代-文集 IV. ①K825.81-53②F752.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9215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福建二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5.5 插页:6

字数:420千字 印数:0001-1 000册

定价: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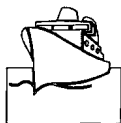
理财治税是安邦治国的一项重要工作。税收治理好了，财政稳健，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税收治理不好，财政失控，分配秩序紊乱，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往往难以持续。治理税收，就是要处理以下两方面的复杂问题。一方面，既要为国家筹集到足够的经费，以运行其社会管理职能；又要筹之有度，不仅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还要尽可能地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这就是要处理好税收与经济以至于生态经济的关系，要以最小的代价满足政府需要、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治税的效率问题。另一方面，从宏观层次讲，首要的是确定宏观税负总规模，其次是选择税制结构、设计税收制度，在各类各层次的纳税人中合理分配税负总规模，不使一部分人感到负担很重，也不使一部分人避免纳税责任，这就是治税的公平问题。

把握公平和效率的科学内涵，摆正公平和效率的相互关系，这是治理税收的基本目标，也是宏观税收管理的主要着眼点。但是，人们关于公平和效率的看法莫衷一是，关于公平和效率相互关系的处置方案更是形形色色。本人从事财政税收学习研究近 20 年，总想从浩如烟海的有关典籍文献中择其精华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研习体会，希冀就治税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为此陆续发表一些文章。1996 年本人申请的科研项目《新财税体制下的宏观税收管理研究》获得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的资助，1997 年本人入选教育部首批“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政府税外收费研究》课题，这使得本人有条件对宏观税收管理的基本

前 言

陈诗启教授是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的开拓者,是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海关史专家。无论在哪里,一提起中国海关史研究,人们总会想到陈诗启先生。他倾注了三十多年的艰辛心血,以惊人的毅力和深厚的功力,先后在七十八岁和八十四岁高龄完成了《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和《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部分)》两部巨著(计91万字),填补了历史学领域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为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留下了传世之作。《中国近代海关史》是国家“七五”规划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后,先后七次获奖,屡膺国家最高奖项。《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荣获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和《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部分)》被选作教育部“研究生教学用书”合订再版。再版后又荣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和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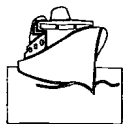
陈教授1915年2月出生于福建省德化县赤水镇。1935年毕业于集美师范,1941年毕业于国立厦门大学历史系,1945年后在厦门大学从事行政、教学和研究工作,历任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主任、名誉主任等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教授即以明代官手工业、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和近代市场形成问题的研究而享誉学术界,著有《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明史讲义》等。他在遭遇“文革”冲击和磨难的艰



难时刻,于1972年毅然选定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作为自己后半生的奋斗目标,搜集、整理和翻译了多达300余万字资料,首次建构了整个近代海关演变的基本脉络,汇编了120万字的《中国近代海关史资料选辑》,选译了七卷本的《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拟定了《中国近代海关史总目录》。从1979年起,他陆续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权威刊物发表数十篇引人注目的高水平专题论文,奠定了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的学术地位。1987年,他的第一部中国海关史专著《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由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被学术界誉为“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专著”。

陈教授不仅开拓了中国海关史研究的荒漠,还致力于推动中国海关史的学科建设。1985年,他卸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重任,集中精力推动中国海关史研究的全面开展。他倡议中国海关学会和厦门大学合办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亲自出任研究中心主任,全力领导研究中心工作。他亲自主编了一套中国海关史研究工具书,共三种,第一册:《中国近代海关地名英汉对照》,第二册:《中国近代海关名词及常用语英汉对照》,第三册:《中国近代海关机构职衔名称英汉对照》。组织翻译《李泰国与中英关系》、《赫德与中国海关》、《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赫德日记》(第一卷)等国外有关著作,发动研究中心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整理档案《中国海关与中英外交关系》(1912—1949)(6册),与厦门海关合作整理《厦门海关历史档案选编》。为了建立一支研究队伍和学术梯队,他在国内率先招收中国海关史硕士研究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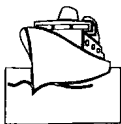
根据海关总署和中国海关学会关于“研究中心对于各关史志的编写,应发挥指导作用”的文件精神,研究中心每年派员分片访问各海关,协助各关史志的编写。陈教授亲自访问了全国15个海关,开设中国海关史讲习班和海关史志编写工作座谈会,审阅了一些海关的关志稿,提出修改意见。各地海关负责编志同志也纷纷专程来厦和陈教授磋商修志问题。为了表彰陈教授对中国海关史研究和海关史志编修工作的巨大贡献,海关总署于1987年特授予他海关金质纪



念章。

鉴于近代中国海关是英国控制下的“国际官厅”，英美等国外交档案和海关外籍人员保存了大量有关中国海关的档案和文献资料，而各国学者对于中国海关史问题也时有涉及，很有必要开展国际交流，以推进研究工作的全面发展。在陈教授的热切倡导下，香港大学于1988年承办首届中国海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1990年，由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牵头，联合《历史研究》编辑部、《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厦门大学主办中国海关史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办中国海关史第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结集出版《中国海关史论文集》。这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对推进中国海关史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起到积极的作用。原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在1990年就对研究中心和陈教授的研究工作有个总的评价：“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是国内海关史研究的重镇。在中心主任陈诗启教授领导下积极推动研究活动和培养后进人才，多年来极有成效。倡议的首次中国海关史国际研讨会虽由港大主办，但研究中心和陈教授是推动者，贡献至大。”

2003年6月间，为了表达对陈诗启教授的崇敬之情，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全体同仁决定在2004年2月为他从教六十年暨九十华诞举办一场庆祝会，同时出版一本论文集。此后，我们陆续收到了美国特拉华大学教授庞百腾、美国莱斯大学教授司马富、加拿大列城大学教授邝兆江、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历史学会会长金冲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汪敬虞、宓汝成、江太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林甘泉、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龚书铎、《历史研究》编审阮芳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虞和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凤美、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张存武、林满红、台湾关税总局研究员赵继祖等组织和个人寄来的贺信或大作。为感谢和表彰陈诗启教授对中国海关事业做



出的特殊贡献,中国海关学会会长赵光华、厦门海关关长毛新堂、厦门海关学会会长朱才良也寄来热情洋溢的贺函。在此,借本书出版之机,我谨代表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全体同仁向各位表示诚挚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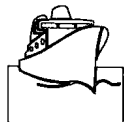
收入本论文集的文章,除了来自海内外专家的佳作外,还有出自陈诗启教授弟子及在读研究生之手的一批新作。此外,还收录部分专家、学者的贺信,以及陈诗启教授从教六十周年暨九十华诞庆祝会上部分来宾的即席发言。

4

谨以本论文集表达我们对陈诗启教授的敬重和爱戴。

戴一峰

2004年10月



目 录

前言 戴一峰

专题论文

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与海关岁入:1875—1879 庞百腾(1)

局内局外的困惑:赫德《旁观三论》读后 卞兆江(25)

国民政府的整理外债(1929—1937) 宓汝成(46)

论中国近代农业企业发展与变化 江太新(79)

1895—1936年中国关税制度与外贸状况的变化 虞和平(106)

闻其言、察其行:《赫德日记》解读

——兼论中西文化中介人 戴一峰(131)⁸⁵

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内地

——厦门、泉州常关内地税个案研究 连心豪(144) 88

再论中国近代海关关栈保税制度的推行 薛鹏志(159)

南京政府的内部分裂与海关“完整性”的破坏 吴亚敏(186)

中国近代植物油出口贸易的发展及其局限 魏娅娅(207)

晚清海关子口税的起源和发展 翟后柱(234)

晚清海关与金融的关系 詹庆华(257)

中国近代海关人事管理的基本架构和特点 孙建国(297)

清季朝鲜海关述论 叶 玮(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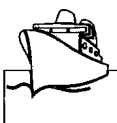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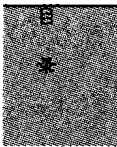
论近代海关与地方社团的关系

——以厦门海关兼管常关为例 水海刚(346)

近代福建海关的海务工作 林 星(358)

1

目
录



赫德与中国近代教育·····	焦建华(374)
海关邮政的扩张:	
从地理空间到制度空间(1866—1896)·····	缪心毫(384)
论赫德的骑马理论及其实践·····	徐从花(398)
试析中美、中英、中日关税新约的异同·····	贾德芳(411)

八 笔谈集萃

辉煌的历程 灿烂的前景

——祝贺陈诗启先生九秩寿庆·····	汪敬虞(421)
--------------------	----------

海关缘

——祝陈诗启先生九秩大寿·····	张存武(426)
-------------------	----------

学问贵有恒·····	章开沅(429)
------------	----------

读《中国近代海关史》感言·····	龚书铎(431)
-------------------	----------

我对陈诗启老先生的认识·····	阮芳纪(434)
------------------	----------

诗启老师总是惦记着我们·····	江太新(436)
------------------	----------

中国海关史泰斗陈诗启·····	叶凤美(438)
-----------------	----------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我所认识的陈诗启教授·····	戴一峰(441)
-------------------	----------

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郭志超(445)
----------------	----------

执著的追求 不懈的探索

——贺恩师九秩华诞·····	詹庆华(447)
----------------	----------

八 贺辞感言

贺函暨座谈会选录·····	(450)
---------------	-------

附录一:陈诗启教授与中国近代海关史的开拓·····	白 蓝(469)
---------------------------	----------

附录二:陈诗启教授主要著述目录·····	(480)
----------------------	-------

致谢辞·····	陈诗启(484)
----------	----------



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与 海关岁入：1875—1879*

庞百腾

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于 1875 年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此前一年，日本人借琉球水手遇难事件对台湾实施了武力侵占。这促使中国回头评估自己过去为国防建设所作的努力，并且直接导致了自 1874 年 11 月至 1875 年 5 月长达半年之久的政策大辩论。尽管还存在着保守性的反对意见，但在省级改革派官员的支持下，总理衙门制定出了国防现代化的计划。直到 19 世纪年代中期，它都是当时中国涵盖面最广的计划。^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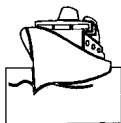
新计划的重点在于海防。根据这个计划的要求，中国开始购买、仿制西式武器和军舰，建立新的兵工厂并对已有的进行扩充，派遣中

* 此文英文本 *China's Defen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Revenue of 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1875—1879*，原载郝延平、魏秀梅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刊》，1998 年，下册，第 979～1006 页。承蒙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张力副所长的热心推荐，陈永发所长欣然应允将译文收入本论文集。在此特致诚挚的谢意。

① 庞百腾：《沈葆楨和中国十九世纪的现代化》，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9～314 页；庞百腾：《沈葆楨和 1874—1875 年的政策大辩论》，1860—1894 年晚清自强运动研究学术会议提交论文；庞百腾：《变易的词汇：19 世纪 60 至 70 年代改革派思想》，载庞百腾、冯兆基编：《理想与现实：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变革，1860—1949》，第 25～61 页；庞百腾：《沈葆楨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66～381 页。

1

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与海关岁入（1875—1879）



国学生留洋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作为对这些成果的补充,中国又对传统的水陆军进行削减、重组,并提高他们的训练水平。但是新计划中最重要的部分在于三个地区舰队的建立:北洋、中央和南洋舰队,每支舰队都是仿西式海军进行装备和训练。全部计划的资金预算是一年四百万两银子,它很快以海防专款之名为世人所知。^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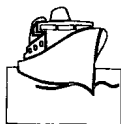
本研究着眼于海防专款的本质。具体说来,它研究专款的资金来源、操作方式以及它对中国的海防现代化做出的贡献。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清朝的财政状况、在政府行为扩张时代对有限财政资源的管理以及它给清政府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提出质疑。而且由于海防专款的主要来源是海关税收,我们置疑这种由外人控制的机构对19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当总理衙门于1875年7月开始着手设立专款时,它意识到整个帝国已经陷入深刻的财政危机之中。由于19世纪中期的叛乱而导致的传统财源的崩溃还没有完全恢复,许多已有的和新的开支项目不得不依赖于两个新的来源:海关税收和厘金。因此,在创设海防专款时,总理衙门也转向这两个来源,以保证新的国防成果可以依赖一个“可靠的收入”。^②

具体说来,专款源于广州、潮州、福州、宁波、登州、沪尾、打狗等地海关上缴中央政府的“百分之四十的海关收入”(四成洋税)以及上海海关税收的一半。总数预期为一年二百万两。另外二百万两源于江苏、浙江(每年四十万两)、江西、福建、湖北和广东(每年三十万两)的厘金收入。这些款项在每年阴历五月和十月被解送给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楨。第一笔款项将于1875年8月1日(阴历七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等编:《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6~155页。最初这笔款项没有名字,但是它经常作为海防专款被人提起。《洋务运动》(二),第346页。

^② 《洋务运动》(一),第148~149、162~16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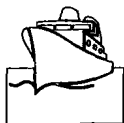
月初一)解送到。任何拖迟或者在数额上的短缺都将受到严厉处理。正如总理衙门所强调,资金的提供是实行新的海防计划的重中之重。^①

考虑到该计划的规模庞大,总理衙门最初设想先在北方创设一支现代海军舰队。^②因此,在专款设立后不久,南洋大臣沈葆楨与总理衙门观点一致,决定应该优先在北方创设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舰队。沈强调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一支舰队,所有沿海和沿江的防御工事将会变得极其脆弱。因此他将属于他的专款中的二百万两份额也提供给李鸿章,一直到这支舰队大致成型为止。但是,关于这支舰队的规模和构成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总理衙门将决定权交给北洋和南洋大臣。按照沈的观点,这支舰队至少应该拥有两艘铁甲舰,六艘250马力的护卫舰以及两艘80马力的炮艇。^③沈尤其希望首先得到一到两艘铁甲舰,因为,正如他在1874年指出的,这样的军舰可以为迄今为止不可想象的海军战略开辟新的可能性。如果中国人拥有两艘这样的军舰,他们至少能够有效对付被沈认作中国最大和最直接威胁的日本人。从1874年到1875年冬天,沈甚至提出要在日意格的帮助下在中国建造一些铁甲舰——后者为当时福州船政局的法国总监督。现在,通过向李鸿章提供他在专款中的份额,沈希望中国不

① 《洋务运动》(一),第148~149、162~165页。在1860年,作为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的结果,英法强迫中国将60%的海关收入用于支付赔款。其余的40%被输往北京的户部。在1866年赔款分期偿清之后仍然存在着这两笔款项的分离。60%的海关收入被各省保留使用。另外40%仍像以前那样输往北京。赵淑敏:《中国海关史》,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第130页。

② 《洋务运动》(一),第164页。

③ 吴元炳编:《沈文肃公政书》,苏州,1880,7:28b-29;李给沈的信,1875年12月16日,见《李文忠公全集》,南京,1905,“函稿”,15:33a-b。



久就可以获得这种军舰。^①

由于被要求提供税款的各个省份既不能也不愿全额解送款项，沈的想法很快就破灭了。作为一名经历过在众多省份间实行“收入分享”的人，^②沈事实上曾预料到各省份的部分汇款短缺。沈向李鸿章提供他在专款中的份额在某种程度上是将这种不良行为减到最低的一种策略，因为在1875年的夏天，沈知道他还有不少时间才可以行使南洋大臣的权力：他仍专注于台湾和福州船政局事务。沈的计划失败了。这样，当郭嵩焘和李鸿章为沈的大度而赞扬他时，在最初的4个月里仅有二十万两银子被解送给李：仅占计划解送的15%。只有广东和浙江的海关，江西和浙江的厘金局愿意解送其全部款项。^③

在一些省份，专款被地方官员视为用北京的钱建立自己的防御措施的良好机会。例如，在山东，专款刚设立，巡抚丁宝楨就开始了他的岸上炮台工程，并争辩说山东沿海在北方防御中具有战略性的地位。这项计划的最初开支(约四万到五万两银子)是从专款中的山东份额支出的，正如后来所证明的，它大部分源于海关税收。与

① 李给沈的信，1874年10月29日，见《李文忠公全集》，“函稿”，14：30；沈的奏折见《海防档》1875年1月8日，卷二，531b；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1890，7：29；沈的奏折，光绪五年六月十一日（1879年7月29日），故宫博物院，台北：《月折档》，光绪五年六月中旬。

② 庞百腾：《太平天国最后几年中（1860—1864）江西的收入与军费开支》，《亚洲研究季刊》，26：1，1966，11，第49～66页；庞百腾：《维持福州船政局：财政与中国早期的现代国防工业，1866—1875》，《现代亚洲研究》，21：1，1987，1，第121—152页。

③ 李给沈的书信，见《李文忠公全集》“函稿”，1875年12月16日及1876年1月16日，15：33—34及36；郭嵩焘给沈的信，见黄潜：《花随人圣盒摭忆全编》，1876年2月4日，许晏骈、苏同炳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8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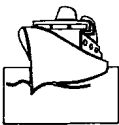
此同时，丁巡抚始终对北方舰队的形成只提供了口头上的承诺。^①

广东的计划更加野心勃勃。在1875年，该省已拥有九艘汽艇，其中七艘购自英国和法国，另外两艘则出自自己的兵工厂和造船厂（建于1873年）。专款甫一设立，两广总督英翰就请允举借外债二百万两用以扩充广东海防。这一请求被户部驳回，英翰被指令与李鸿章和沈葆楨一起构建未来的海防计划。^②但是当刘坤一于1876年1月取代英翰成为两广总督时，他继续致力于广东独立的防御计划。在那一年，他用八万两银子从英国人手中买下位于黄埔的造船厂，又于1877年，计划耗资十万两银子建造十四艘小汽艇，这还没有包括每年五万两银子的经费在内。^③这些开支都源于该省的厘金收入。在整个70年代的后半期，该省每年拨款三十二万四千到四十九万二千两银子用于该省自己的防御措施。在70年代后期，尽管有来自朝廷方面的责怪，广东的厘金收入却没有一两银子解送给海防专款，部分原因是基于此。与此相反的是，从该省官员较少能染指的海关收

^① 丁的奏折，1875年10月29日及1876年3月29日，见《洋务运动》（二），第339~344页。

^② 英翰给总理衙门的奏折，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875年6月26日）；光绪元年五月二十六日（1875年6月29日）的奏折；户部给总理衙门的行文，光绪元年六月十二日（1875年7月14日）。均见于《总理衙门档案》，台北，“俄”档（俄罗斯档案）154：“筹借洋商银两”。

^③ 《洋务运动》（二），第364~367、371~372、407~412页；参见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南港，1963年，第111~112页；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二卷，第581页。



人相当部分被解交给专款。^① 尽管如此,由于厘金收入被用于购买或制造小的内河巡逻艇,广东的成就对整个海防计划贡献甚微。

李鸿章对山东和广东地方当局的态度尤其不满。沈葆楨也对这种虚假的财政安排深感不快,于是向李建议联合上奏朝廷,以确保户部能制止个别省份对专款的侵挪。李认为这种行动是不明智的。他告诉沈,户部会习惯性地推托,任何强制性的努力都只是徒劳的。^② 此外,由于批评了左宗棠的西征,李最近遭到了极端保守势力的责骂,他已没有较强的立场去挑战他在沿海各个省份的对手们。^③ 结果,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各省对专款的侵挪通过两种方法实现。第一,各省无视国家的整体需要而各自追求自己的国防现代化,他们仍将各自的开支加在专款上。一些省份涉及的数额较少,如山东;但也有达到巨大份额的,如广东。第二,各省份又不愿意交出份额的其余部分。在李和沈看来,大部分省份仅把专款置于支出的底层。这尤其体现在厘金收入的支出上。各省在厘金收入上都有比在海关收入上更大的控制力。毫无疑问,这样的操作在各省继续进行着:当有更多的收入可用于地方时,地方官员和领导者无论是通过合法的行动或是侵吞盗用都可获得利益。因此在日本人入侵台湾期间和之后兴起的军事建设

① 广东从其海关收入中对海防专款的解送每年固定为二十四万两。这在1876年8月降为十二万两。在第一年(1875—1876)里,它是全额解送,在1876—1877年是91.67%解送,而在1877—78及1878—79年,是82.5%解送。参见庄吉发:《清季南北洋海防经费的筹措》,《大陆杂志》,55:5,1977年11月,第228~229页;《刘坤一遗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卷一,第398—399页;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26卷),台北:故宫博物院,1973年,卷二,第142、160、229~230、234~235页。

② 李给沈葆楨的书信,1876年1月20日。见《李文忠公全集》,“函稿”,15:37。

③ 李对沈征西的反对,见徐中约:《1874年中国的政策大辩论:海防与塞防》,《哈佛亚洲研究季刊》,25,1964—1965,第212~228页。



狂热中,广东只是由于其规模巨大的防御计划和其高级官员的不合作态度才变得臭名昭著。^① 沈葆楨将他专款中的份额转送给李鸿章所表现出的爱国心并没有对广东当局产生任何影响力。

但是,各省对专款的侵挪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大部分专款未能解交仅仅是因为户部的糟糕规划。即使在专款设立前,北京中央政府也清楚知道,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省份都是远远的人不敷出。专款设立所增加的财政负担是显而易见的。广东的情形同样可以作为例证。该省的厘金收入额为一百一十余万两,其中的96%(一百零五万六千八百两)已经被用于“优先”支出。这包括修建皇陵的支出、京饷的例输和对左宗棠西征的援助。广东用厘金就能够承担它的防御计划仅仅是因为它在许多“优先”项目上存在着拖欠行为。^② 正如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的,因为不得不承担长江口大部分防御设施的支出,江苏的情形更为糟糕。但即使在像湖北这样没有主要的防御责任的省份,它的收入仍然短缺,^③仅有很少一部分资金用于专款。正如李鸿章敏锐地指出,户部创立专款仅是一种花招而已。^④ 没有中央的全盘预算和对优先开支的重新安排,以及对那些李、沈、丁日昌和其他人在政策辩论中所指出的浪费财力机构的削减,专款不能实现它的基本目标。因此,在专款设立的头一年间,只有七十万两银子到位,仅占全部预算四百万两的17.5%。^⑤

认为沈葆楨致力于把中国发展为海上强国的说法是一种夸大,

① 另外,广东也从事于许多要塞建设和购买炮舰计划。由于它的厘金和其他收入已告枯竭,为处理紧急事件它不得不从明确标明为专款所有的海关收入中支取款项。见《洋务运动》(二),第411、432~434、435页。

② 《洋务运动》(二),第365~366页。

③ 《洋务运动》(二),第363~364页。

④ 李给沈的信件,1875年12月16日。见《李文忠公全集》,“函稿”,15, 33b。

⑤ 《道咸同光四朝奏议》卷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第3042页。

